

學術論文

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與國際關係理論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and Its Impact to IR Theories

盛盈仙 *Ying-Hsien Sheng*

東海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環境議題已然成為當前最困難的集體行動之一。依循歷史脈絡發展可觀察出，各國若尋求共同合作，則須從內政及外交的雙重協調中尋求出口突破。本文將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主要界定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其中，除了以這些途徑的論點主張作為理論基礎外，亦將之與氣候環境議題的部分加以結合分析。然就實際研究主題而言，上述理論內容並不能完全解釋現今各國氣候環境變遷議題合作之狀態與發展。因此，本文將提出更適用於氣候變遷議題探討三項核心研究途徑基礎，分別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第二意象反轉」及「雙層博弈」。本文嘗試以回顧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之理論背景及發展為開端，期能找出一個解釋力相對足夠的環境議題理論分析，以提供後續對於國家間環境議題合作研究之基礎。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ollective actions. Following the historic text, we can observe that once nations

seek to cooperate mutually, it must go through a serious of negotiations amo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ctors.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view the IR theories as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Besides using these theories to be our research basis, they will be analyzed further by combining IR theories as well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According to our topic, however, any single theories couldn't expla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completely. As a result, we will come up with a proper explanation which includes another three core approaches. They are New-classical Realism, Second Image Reversed and Two Level Gam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hopefully to find out a better and more full-explained method to support our environmental issue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關鍵字：全球氣候變遷、新古典現實主義、第二意象反轉、雙層博弈

Keywords :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w-classical Realism, Second Image Reversed, Two Level Game

壹、前言

2010年11月2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第十六次締約國會議在墨西哥坎昆召開。此會同時也是「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第六次的締約國會議。該會討論的焦點亦圍繞兩大主題，包括對「京都議定書」地位再認定以及資金與技術的問題。然自京都議定書始，經歷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到近日的坎昆協議，其中隱含著許多來自於已開發與未開發國家之間的「認知差距」。猶有甚者，亦頻出現「政治意涵」高於「環境承諾」的質疑，使得環境議題的焦點模糊不清。環境議題已然成為當前最棘手，最困難的集體行動之一。Garrett Hardin自1968年提出「共有財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¹被視為是當代晚期首波關注環境議題的先聲。文章中論述到因濫用環境資源而造成共有財的悲劇，因為共享了整體的資源，個體(個人或國家)理性的計畫將會導致整體環境的傷害。2005年Marvin Soroos回應了Hardin，其主張並非所有的環境問題都必然是悲劇，²並提出多項途徑以避免環境的悲劇。2010年Joshua Busby指出國家必須要建立制度或手段(instruments)，以追求有效的氣候治理。³項觀點也與David Victor所提出一套更有效率回應氣候變遷議題的觀點相似，其認為必須以國家(主要碳排放國)為單位，共同商議以促進良好的合作機制設計。⁴

¹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162 (1968), pp.1243-1248.

² Marvin Soroos, "Garrett Hardin and Tragedies of Global Commons," in Peter Dauvergne ed., *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5), pp.35-49.

³ Joshua Busby, *After Copenhagen: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Road Ahea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10), pp.1-2.

⁴ David Vict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Number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Robert Art and Robert Jerv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ongman, 2010), pp.516-521.

依循歷史脈絡發展可觀察出，各國若尋求共同合作，須從每個主權國之內政及外交的雙重協調中尋求出口突破。因此，環境問題乃具有雙重屬性。國際環境的協議，同時是國際博弈與國內博弈相互交織及互動下的結果。1978年，Peter Gourevitch 探討了國際體系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同時也反觀國內結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結構的結果，同時也是成因。「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是彼此相互關聯的。⁵隨後，Robert Putnam 於 1988 年提出著名的「雙層博弈邏輯」(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亦提到：國內與國際政治是彼此相連糾結，在詮釋上應同時包含國內成因及國際效果，與國際成因及國內效果兩個層次。⁶

本文的核心研究途徑及理論基礎有三，分別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第二意象反轉」及「雙層博弈」。以下，茲先就本文三大基礎的核心討論範疇與議題整理如下。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結合氣候環境議題的說明分析。此部份的研究途徑包含：第一，氣候環境議題及美國行為的「多層次分析」。第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促進「合作」或是「衝突」，須視當時狀況而定。第三，思考已開發國家之責任與美國國家利益的考量因素。其次，將「第二意象反轉」之論結合氣候環境議題的說明分析。此研究途徑亦有三大討論主題：第一，國際體系深切影響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第二，全球氣候變遷議題同時亦深受國家間權力分配所影響。第三，國內因素及國際因素同時交織影響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議題。最後，「雙層博弈」結合氣候環境議題的說明分析。此可含括了下述三點：第一，討論有關氣候環境議題中的「不協議成本」(the cost of no-agreement) 與環境規範及協議的關連性。第二，全球氣候變遷議題如何受到美國國內之因素所限制。第三，氣候及環境暖化議題與美國極大化他方「獲勝集合」的體現。

⁵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4 (1978), pp.881- 882.

⁶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430.

貳、國際關係三大理論與環境議題

一、現實主義理論與氣候變遷及環境議題

1960年代晚期如 Garrett Hardin 等派的學者，對於環境資源及公共財議題的探討多從「人口」的角度切入研究。亦即當全球人口快速成長的同時，亦會帶來許多不可避免的環境悲劇。如：Paul Erlich 在 1968 年《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 中，提到了快速的全球人口成長率，對於有限資源的浩劫與可能帶來的傷害…等。⁷1968 年 Hardin 將濫用環境資源視為是共有財悲劇的實例，敘述個體的理性計算 (rational calculation) 因共享集體的資源將會造成整體環境的傷害。他同時將世界資源的承載力比喻為「救生艇」(lifeboat)；並將「人口過多的國家」類比如同「過度擁擠的救生艇」，若不能限制這些國家過多的人口成長，那麼就會危及整艘船的安全。⁸Hardin 並且強調過多的人口所造成的環境問題，不能依賴富有國家擔負責任而解決。人口過多的國家若不限制出生率，那麼這些過多的人口成長壓力以及食物需求，將會壓迫到已開發國家的食物生產能力。⁹

根據 Hardin 等所提出的概念可觀察出，在無政府狀態下，共有財的使用因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威機制加以規範維護，而走向共有財的悲劇。基於個別行為者理性的計算，享受共有財所帶來的好處，然對整體環境卻會造成傷害。國家是自私而貪婪的，對於資源利益的追求無窮止境且彼此衝突。因此，已開發國家並無必要去「完全承擔」這些環境資源的維護成本。相反的，我們必須要正視開發中國家（如：中國或印度）因人口過多所可能帶來整體環境負載過重的後果。再者，正因無一強而有力的中央權威加以限制管理，Hardin 提出若無限制的給予使用公共資源的「自由」(freedom)，那麼將會毀了整體 (brings ruin to all)。因此，要解決環

⁷ Paul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Sierra Club, 1968).

⁸ Hardin, *op. cit.*, pp.502-507; Soroos, *op. cit.*, pp.35- 49.

⁹ *Ibid.*

境的爭議必須要強加動機來限制天然資源的使用。

Richard Matte 則提到隨著全球變遷的時代成熟，環境及安全的連結已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工業的發展過程及改變已與環境變遷及安全問題息息相關。¹⁰工業科技的興盛進步帶來了商品生產、交易以及貿易的活絡。但卻有如雙面刃般，因現代化工業繁榮發展之下所可能造成有形、無形的環境汙染而引起爭議。Matte 強調不論是個人或是國家、是個體或是群體，都必須要重新思考環境的安全。因此，在「理性」與「自利」的因素考量下，顧及國家利益與維護環境共有財，成為必須謹慎思考的議題。Barry Schwartz 認為：公共財的問題是由所有個體與集體、短期與長遠間的利益衝突所交織形塑而成。¹¹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由於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研究者在切入討論相關「發展」議題時，往往將「觀光」視為一個有助於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向「已開發」國家學習現代化的重要媒介，不過，來到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受到依賴理論影響，研究者在切入討論相關「發展」議題時，卻轉而採取一種較為批判的立場看待「觀光」，關注於「觀光」在全球資本主義剝削體制內的角色，如何鞏固南北發展落差並為落後國家造就各種弊病。Schwartz 並清楚論述到若沒有給予這些背叛者清楚真實的代價或提供促進合作的誘因，那麼所有關於環境變遷的條約都將持續是毫無用處的。¹²

二、自由主義理論與氣候變遷及環境議題

自由主義學者普遍認為因跨國通訊網絡的建立發展與科技、經濟整合的結果，加深了國家間依存關係並提高了全球的互賴程度。對於維護環境

¹⁰ Richard Matthew, "Man, the State and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Peter Dauvergne ed., *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5), pp.127- 144.

¹¹ Barry Schwartz, "Tyranny for the Commons Man," in Robert Art and Robert Jerv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ongman, 2010), p.509.

¹² *Ibid.*, p.510-11.

的永續發展須仰賴各國共同承擔責任。自由主義者認為，在公共財資源的議題中，**Regime**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進而增加合作利基。**Victor** 在回應如何使氣候變遷議題的集體合作模式更為有效時提出包含了：理解「國際合作的需求」、「參與國的數量及其利益」的再思考、與評估「促進合作的機制設計」。¹³ 希望能透過機制的改良來促進合作，將協商的過程視為是一種外交上的努力，並透過合作來增進氣候變遷議題的共識。

在氣候變遷議題上，自由主義認為功能性的國際組織、專業社群與其他非政府行為者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Stacy VanDeveer** 在論述國際環境合作及其效率發展的相關研究中，曾提及國際環境協議必然受到許多行為者的行為影響，除了國家之外，尚包括許多非政府行為者、公司、社會及個人。¹⁴ **Keohane** 及 **Nye** 在比較現實主義與複雜互賴下的政治進程中，提出在複雜互賴的條件下，「相互依賴」、「國際組織」及「跨國行為者」的管理將成為政府政策工具的主要手段。¹⁵ **Busby** 更是明確指出：「氣候變遷的議題不能單靠政府之力完成，必須要與私人（非國家行為者）共同努力發展新的氣候協議。」¹⁶ **Busby** 肯定 UNFCCC 存在的貢獻與價值，即便常遭受到外界關於其「有效性」的質疑，但仍認為其是一個有用的機制，但應要在效率上更加強化。如：藉由小團體的集會解決問題、動員氣候的財政支持…等方面著手。¹⁷ 此外，除了聯合國的「氣候變遷的政府間小組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外，**Busby** 也具體提到了諸如：「全球環境機構」（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以及「乾淨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等環境議題變遷的相

¹³ Victor, *op. cit.*, pp.515- 522。

¹⁴ Stacy VanDeveer, "Effectiveness, Capacity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Peter Dauvergne ed., *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95.

¹⁵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p.22-30.

¹⁶ Busby, *op. cit.*, pp.1-3.

¹⁷ *Ibid.*, pp.5-12.

關組織。這些組織除了能協助提供匯聚各國聲音的交流平台、協調全球氣候政策外，亦能促進改善環境變遷的發展。

有關國家對於涉及公共財的維護與協調的環境議題下，自由主義論者多採取較為樂觀的視角分析。如 Goldstein 就曾指出：「『環境』的議題就如同其他國際政治經濟的問題，環境保護涉及公共財的提供和維護，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減少相關國家衝突，…而在這方面，Regime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Keohane 及 Nye 也曾在探討公共資源與環境建制變遷的研究中，論述到世界在「複雜互賴」的條件下，問題和溝通管道將逐漸走向多元化，公眾態度及利益團體的變化也將會大大削弱武器的作用。¹⁸因為國家會意識到使用武力與成本與代價太高。因此，相互依賴下之規則與制度安排，將促使軍事力量位居次要的地位。

三、建構主義理論與氣候變遷及環境議題

建構主義學者 Margaret Keck 及 Kathryn Sillink 相當重視「思想力量」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活動者 (activists) 將其「道德理念」及「價值觀」組織起來，透過「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的概念建立國家參與的聯繫管道。而這些共同的道德觀及規範，即構成支撐建構主義相當重要的核心價值。Keck 與 Silink 曾談論到非政府組織及跨國倡議網絡下的「環境倡議網絡」(Environmental Advocacy Networks)，行為者所採用的是一套規範、利益和價值觀念。¹⁹而以建構主義的視角結合環境議題的研究，他們認為「環境倡議網絡」藉由尋求有力的行為者與機構來擴大實現自己的期望，重視網絡內部培養組織者良好的問題思考與應對意識。這也顯示了建構主義者重視以「觀念」及「意識」來思考環境等公共財的議題。除了「國家」行為者外，建構主義認同其他諸

¹⁸ Keohane and Nye, *op. cit.*, pp.3-36.

¹⁹ Margaret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如：國際組織、雙邊援助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等行為者在環境議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也認同國家與國家之間在環境議題上的互動，會反過來形塑整個體系的運作。亦即，國家的角色與他國的互動能夠形塑環境議題合作的運作模式。Erika Weinthal 曾從中亞區域的例子去探討「國家角色」與「環境合作」之間的關係。²⁰ Weinthal 特別是從一種「結構」的視角去研究國家在環境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國家與外部行為者的關係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決策制定，同時，政治相對的穩定度也會關係到環境資源的議題。由於建構主義學者強調「科學性」與「客觀性」，因此套用於環境議題的研究時，除了「政治」的影響外，建構主義學者強調以「科學性數據」去解讀環境的議題。Harry Collins 及 Robert Evans 就曾將這種科學辯論下的政治化延續（politicized continuation）視為是建構主義科學研究的邏輯性結果。²¹們試圖強化「科學數據」（專門技術）與「政治意涵」（權利與控制）間彼此的關連。並且認為「科學數據」能夠解決公共問題中的正當性問題。David Demeritt 曾論述到：「氣候變遷的案例顯示出：要明確區別科學的問題及與之關聯的價值問題是非常困難的。」²²

參、國際關係三大理論應用於環境議題之比較

綜上所述，本節將回顧三大理論並綜合比較分析其運用於環境議題解釋性之比較。首先，回顧「現實主義」理論結合氣候環境議題包含：第一，利益掛帥。國家會運用一切力量極大化「國家利益」。氣候環境議題由於涉及複雜的公共財問題，涉及技術的開發與移轉、資料的蒐集與轉化，因此

²⁰ Erika Weinthal, *State 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Link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²¹ 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2 (2002), p.263.

²² David Demeritt, "Science Studie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35, No.3 (2006), p.474.

須付出相對的時間與資金成本。集體行動所造成的無效率更會擴大國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在「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者眼中，當因應環境議題會損及一國利益時，國家捍衛並追求其利益的動機是難以消除的。第二，理性考量。國家的所有行為皆是「理性」評估後的結果。現實主義認為「理性」能夠驅使行為者追求並擴張近在眼前的短程利益。然而，解決氣候變遷問題乃屬於一項必須拋開一時得失而長遠追求的永續目標。依據現實主義者的觀點，若重視群體的長遠利益勝於己身的短程利益，都不是理性行為的表現。第三，合作無解。「衝突」才是國際關係的常態，「合作」只是例外。Nicholas Spykman 曾將「合作」視為是國際關係上國家少有罕見的模式。²³

最後，「建構主義」理論的要旨與氣候環境議題連結，可包括：第一，重視價值。氣候環境的議題涉及環境永續生存的「意識」，以及透過道德理念的價值性來號召行為者共同解決環境問題。此類非物質性的「價值」、「認同」與「規範」，同時也對氣候環境議題的行為者產生了影響。第二，國家互動。國家與國家在環境議題的互動，成為形塑氣候環境議題合作模式的重要影響。國家與其他國際政治中的行為者亦同時扮演重要的角色。包含政治穩定度、政策制定…等皆會成為影響氣候環境議題的重要因素。因此，環境議題合作模式並非是既定的，而是國家與國家互動中所生成的。第三，融合科學。科學數據提供了氣候環境議題探討時的重要依據。此包含了溫室氣體排放量檢測及其與地球溫度升高之間的關係、地球溫度升高與人類生存環境的關連…等。重視科學性的結果與現實觀念價值下的結合，此觀念價值亦符合了「客觀性」。

然就本文實際研究主題而言，筆者發現上述理論內容並不能完全解釋現今各國氣候環境變遷議題合作之狀態與發展。以「自由主義」理論為例，不論是早期的理想主義、中期的自由主義或是晚期的新自由制度主

²³ Colin Hall and Alfred Oehlers, *Tourism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Issues and Cases*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0), p.81.

義…等，其雖共同強調了「合作」所帶來的雙贏互惠與收益，也對「國家合作」之前景抱持樂觀。但現實世界在歷經多次氣候變遷及國際合作會議下的狀況，卻讓我們觀察到國家間利益角力的「衝突」本質在國際氣候變遷合作的場域中展現無遺，進而使國家合作共創雙贏的期待蒙上一層陰影。又就「建構主義」而論，強調整體國際結構或制度對個體的影響因素固然重要，但就現今國家角色與氣候環境變遷的議題來看，國家行為者既受到外部因素所影響、亦受到內部因素所控制。因此，不僅受到國家間權力及國際結構分配所影響，內、外因素都須囊括考量在內。

而就現實主義而言，其「利益至上」、「理性考量」與「合作無解」之主要論點主張雖較能符合當前各國因應氣候環境變遷議題的現狀。然現實世界的「無政府狀態」並不完全如「攻勢現實主義」論者所強調的—是個無法避免的衝突。是故，就環境議題的討論範疇而言，國家間形成合作或衝突之發展，須端視當時內、外因素的考量來看。綜上所述，傳統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不能構成本文議題研究的理論核心。因此，本文將援引現實主義理論中一個融合古典現實主義及外交政策主張的新興分支—「新古典現實主義」。除了將新古典現實主義視為本文主要的理論研究基礎外，同時納入另項重視國家間權力分配、國際體系影響因素的「第二意象反轉」之論，以及結合強調內、外在因素互相牽連影響的「雙層博弈」理論主張。將此三項重要的理論基礎結合，以期能提供在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下的國際合作議題研究中，有一清晰、完整的分析全貌。

肆、適用於氣候變遷及環境議題之理論探討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

(一) 新古典現實主義

首先，就「興起背景」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較

晚生成的理論。在此之前，國際關係理論時值「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辯論的學術浪潮之中。學界普遍對於國際體系的本質及其對國際結果（如：和平或戰爭）的影響、多極或雙極體系何者較具衝突本質、以及國際制度與增加合作性之間的關聯…等議題進行討論。²⁴「新現實主義」從關心「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出發，在一個給定的體系下，試圖解釋國家的行為結果及其互動。Waltz 提出須從國際體系（包含：國際結構）的「層次分析」（level of analysis）來解釋國際關係現象。²⁵此一符合當時時代背景的理论隨著「冷戰」的結束，興起後續一波波對其理論解釋性的質疑與批評。²⁶原本發展處於較弱勢的「外交政策分析」亦在歷經多元化的修正調整後改頭換面。²⁷現實主義在承受諸多批評與挑戰下，逐步修正並進而形成了多項以現實主義為核心基礎下的「分支」。新古典現實主義便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因素下生成，成為一套主張融合古典現實主義及外交政策分析論點的折衷派分支觀點。

其次，就論點主張而言。Rose 將「新古典現實主義」定義處在「純結構理論者」（pure structural theorist）與「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間的「中間路線」（middle ground）。²⁸其既受到外部國際政治的影響、也受到內部因素所控制。其同時強調「系統誘因」（systemic incentives）中「獨立變項」與「內在因素」（internal factors）中「中介變項」所扮演的角色。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世界的「無政府狀態」是渾沌不明且難以理解的。其仍

²⁴ Rose, *op. cit.*, pp.144-145.

²⁵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0), p.40.

²⁶ 當時對「新現實主義」提出的主要批評包括：第一，無法對國際關係重要的發展演變做出警示與預測。第二，無法解釋國際權力的變化及其轉向新結構的方式。第三，無法解釋國家外交政策行為的變化。第四，忽視國內政治的重要影響。第五，忽視決策者對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的影響力。詳細整理內容參閱：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2005年），頁121。

²⁷ Laura Neack et al.,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2005), pp.1-16.

²⁸ Rose, *op. cit.*, p.152.

以「權力」作為主要分析基礎，但更強調透過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因素「移轉權力」。²⁹亦即，除了國際權力的分配、國家相對能力的改變之外；決策者的認知、單一事件的衝擊影響、國內政黨及政府的能力與國家領袖動員人力與物質資源的能力…等，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關注的焦點。其理論的因果邏輯可參考表一所示。Brian Rathbun 將新古典現實主義視為是新現實主義的延伸、結構現實主義的產物。其認同 Rose 提出新古典現實主義須同時關注到「內在」(internal) 因素之觀點：「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具有的一致性邏輯，包含了觀念 (ideas) 及國內政治 (domestic politics)。」³⁰而這兩項因素恆常是影響決策制訂的重要因素。

最後，就「回應其他理論」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挑戰了其他理論的重要觀點。第一，認為「國內政治」(inner politik) 理論太側重單一型塑國家外交政策的因素，認為其引導的方向是錯誤的。第二，提出「守勢現實主義」太強調國家對威脅的回應、而忽略了那些由「相對物質權力」(relative material power) 形塑出對威脅的認知。第三，相較於「攻勢現實主義」所假設國家追求「安全」(security) 的觀點，「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尋求著的是「控制」及「型塑」外在環境以回應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不確定性。³¹

(二)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氣候環境議題的結合

若以「美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則將本文探討的理論基礎結合氣候環境議題的說明分析如下：第一，氣候環境議題及美國行為的「多層次分析」。新古典現實主義主張採取多層次分析來研究影響國家對外行為之因

²⁹ Randal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317- 318, 321-322.

³⁰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17 (2008), p.296.

³¹ Rose, *op. cit.*, pp.150-152.

素。³²就環境議題而言，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外在因素（如：「美—中」的相對權力消長）與決策者認知（如：時任美國總統的態度）及國內政治（如國內民意、政黨及國會傾向）…等的內在因素，皆會影響美國對環境議題的行為與回應。因此，透過「多層次分析」較能全面的解釋並分析一國環境議題的外交政策行為。

第二，無政府狀態促「合作」或「衝突」須視當時狀況而定。由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世界的無政府狀態充斥著不確定性及複雜性。³³因此，必須視當時的內、外在因素來觀察其形成國家合作或衝突的發展。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如「攻勢現實主義」所言會造成不可避免的國家衝突；也不全然如「新自由主義」所樂觀期望能以互惠合作化解衝突。因此，就氣候環境議題而言，觀察並分析美國當下的內、外在因素將更有助於解釋國家間「合作」或「衝突」的行為關係。

第三，已開發國家的責任？—美國的國家利益考量。「新古典現實主義」視「權力」為國家的能力資源。當國家擁有越多的能力資源，越有助於其對外行動的能力。這些對外行動亦包括了國家利益的考量。³⁴就氣候環境議題而論，美國相較於其他國家擁有較高的能力資源及對外行動的能力，然由於本國的國家利益考量，促使美國思考國際合作行動所須付出的相對應成本—包括：投入資金援助及技術轉移給開發中國家。對美國而言，全球日益嚴重的暖化危機不應僅是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所獨攬的責任。

二、第二意象反轉（Second Image Reversed）

（一）第二意象反轉

Gourevitch 於 1978 年於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刊中發表了一篇

³² Matthew, *op. cit.*, p.124.

³³ Rose, *op. cit.*, p.171.

³⁴ *Ibid.*, p.125.

有關國內政治及國際因素的探討一文，其中提出著名的「第二意象反轉」之論，深切影響到後世眾多研究國內與國際政治互動的學者。該文首頁即論述到：「要回答有關國內的諸多問題，則必須要先將國際體系視為解釋的變項。」³⁵此說明了一項貫串本文的核心概念—亦即「國內結構」並非僅是影響「國際政治」之因素，而可能是受到其影響的結果。此外，Gourevitch 分析了國際體系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及層面涵蓋範圍包括：國際體系及國家間的權力分配、國際經濟或經濟行為與財富...等方面。由此可知，Gourevitch 強調在理解國內經濟行為及國家政策時，亦須將整個大環境及國際環境的結構視為重要的觀察前提。此外，他也特別論述了外在因素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結果，可反映在以下幾項：包含特殊事件、特定決定、政策、聯盟的形態...等。³⁶因此，「第二意象反轉」所提出的論述除了提出國際因素的重要性之外，亦突顯其與國內結構因素之間互相牽連影響的互動關係。

Gourevitch 強調國內結構深受國際體系影響之論述。³⁷亦即不論在經濟或是政治、軍事等方面均受其決定而影響。同時，國際關係的研究中也包含了許多有關國內結構重要性的討論。因此，Gourevitch 提出幾項重要的研究命題：第一，相對於世界經濟中的國家定位為何？國家的政策是否與其期待一致？若一致，那麼就不能解釋為「國家結構」凌駕於「利益考量」之上。第二，在社會之中，誰才是政策的受益者？又支持或反對政策的對象為？若政策與某個聯盟或團體的期待一致，則國家成為主導因素的說法變得薄弱。第三，政策的選項由誰定義？政策制定是否在體制內進行？若否，則顯示出國家僅是一種工具手段而已。第四，政策何以具有合法性？政策的阻力與助力為何？即用何種方式能將政策推行成功？又何者的反對將阻礙政策的推行？³⁸總的來看，Gourevitch 嘗試將研究視角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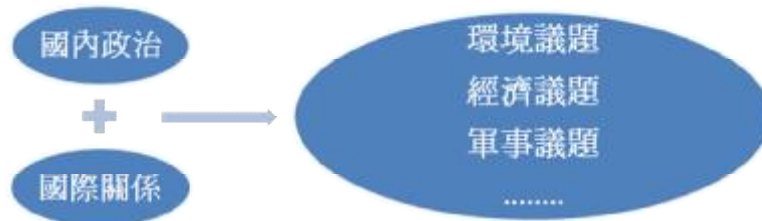
³⁵ Gourevitch, *op. cit.*, p.881.

³⁶ *Ibid.*, p.883.

³⁷ *Ibid.*, p.900.

³⁸ *Ibid.*, pp.906- 907.

國際體系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並試圖聯繫起國際與國內層次的雙向關係。其示意圖如圖二所示：



圖二：「第二意象反轉」論點主張示意圖

資料來源：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4 (1978), pp.881- 911.

（二）第二意象反轉與氣候環境議題的結合

「第二意象反轉」與氣候環境議題的結合分析說明如下：第一，國際體系深切影響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第二意象反轉」之論提出並強調「國際體系」對「國內政治」之重要影響。以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議題而言，國際政治的影響因素包含：在聯合國各項組織框架下，各國共同研究商議之二氧化碳減量排放機制運作、已開發國家協商提供開發中國家各項技術及資金支援等的環境承諾、各國國際環境協議的規則與規範…等。這些外在環境的國際性因素均會對美國的國內政治產生效應。

第二，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亦深受國家間權力分配所影響。「第二意象反轉」特別重視國際間的權力分配變化。就美國而言，由於在國際政治的權力地位中，美國掌握了優勢的資源與主導地位，其在各大國際環境協議中所表現的立場與態度也成為影響國際間各國執行環境協議的關鍵因素。因此，在環境議題下的集體合作協商模式中，超級大國的走向與立場與各國相對權力地位的變化…等均會成為影響國內政策走向的重要觀察點。

第三，國內因素及國際因素同時交織影響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議

題。就 Gourevitch 的研究觀點，其雖提出應重視「國際體系」對「國內政治」的重要影響，但仍在文章歸納總結時提及：「在分析及研究議題時，須將具有緊密關聯性的國際及國內層次因素同時納入，才能得到完成研究觀察的全貌。」³⁹是故，就「第二意象反轉」之論結合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議題，在研究途徑與範疇上，則須同時將環境議題中「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兩者不同層次的因素結合起來。藉此觀察國家在內政及外交上的互動模式及其發展，以求一完整、清晰的分析圖像。

三、雙層博弈 (Two Level Game)

(一) 雙層博弈

Putnam 在 1988 年以雙層博弈的邏輯論述外交及內政間糾結牽連的關係，提出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間彼此相互影響的論述。⁴⁰雙層博弈理論提到若國家受到來自國內的壓力愈大，那麼其在國際上的相對位置愈弱；⁴¹國內的政治活動亦會收受國際壓力所強化。⁴²就美國的例子而言，Putnam 觀察到：由於美國國內規定任何協議或條約的「正式生效」(ratification) 批准，皆須經過參議院的正式投票程序通過。⁴³因此，國內所要求「多數決制」的高門檻常成為國際談判上的重要影響因素，此亦時常成為談判者

³⁹ Colin Hall, *Tourism and Politics: Policy, Power and Place* (New York: Wiley & Sons, 2004); Joan Henderson, "The Politics of Tourism in Myanmar,"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Vol.6, No.2 (2003); Frances Brown, "Is Tourism Really A Peacemaker?" *Tourism Management*, Vol.10, No.4 (1989), pp.270-271.

⁴⁰ Abraham Pizam, *Does Tourism Promote Peac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friendly Nations* (Chichester: Wiley, 1996), pp.203-213.

⁴¹ Rebecca Stein, "First Contact and Other Israeli Fictions: Tour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Public Culture*, Vol.14, No.3 (2002), pp.515-544; Samuel Kim et al., "Using Tourism to Promote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34, No.2 (2007), pp.291-309; Yu Lixin, "Politics and Tourism: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 Strait Relations in the Past 20 Years," <http://www.seiofbluountain.com/upload/product/201003/2010cygchy02a2.pdf>

⁴² Putnam, *op. cit.*, p.429.

⁴³ *Ibid.*, p.436.

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國際因素（如：利用國際盟友之力）亦常成為給美施壓的另項手段。Putnam 提及到：「國內及國際事務顯示了國內在外交政策上的若干影響，為我們對國家及國際事務的連結性提供了觀察。」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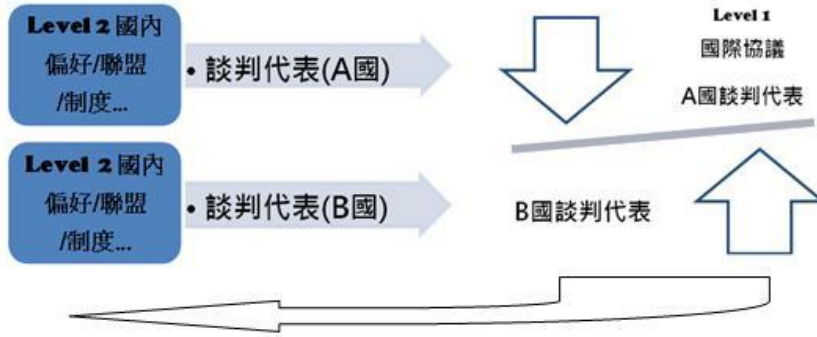
此外，Putnam 認為對於國內及國際政治的互動不能僅止於觀察，而必須要試圖跳脫超越並提出一個能夠解釋並說明兩者間互相牽連糾結的理論。是以提出並區分了兩個層級：（一）國家層級（**national level**）。（二）國際層級（**international level**）。前者提到的範疇包括了：國內團體藉由施壓政府來追求採取其偏好的政策；亦或是從政者藉由與團體間建立聯盟來尋求權力。後者則是透過國家政府來極大化自身能力來去滿足國內的壓力，亦即試圖極小化國外之發展所帶來的不利結果。⁴⁵綜上來看，雙層博弈是一個相對複雜的概念，因為若有任一主要行為者（**key player**）不滿意在國際層級上的結果，那麼必然會成為影響談判的因素。且就領導者而言，也會存在因無法滿足國內追隨者的期望而失去領導地位之風險性。這些均構成涵蓋國內與國際過程的互動。

雙層博弈理論應用在談判議題的兩大階段定義與 Putnam 所提的「獲勝集合」（**win-set**）及其決定因素分述如下：第一，兩大階段。（一）第一階段（**Level I**）：由談判者之間進行談判後，所導致一初步、非確定性協議的階段。（二）第二階段（**Level II**）：談判者與其內部的選民或追隨者討論是否通過並生效協議的階段。在上述這兩階段中均反映出彼此互相牽連影響之處，例如：對於第二階段協議生效的需求，會影響第一階段的談判；在第二階段協議被否決的預期亦可能中止第一階段的協議…等。因此，協議核可生效必須是兩階段所共同協調並同意通過的，亦即若無第一階段談判者的同意，談判者不能在第二階段中逕自修改協議內容。是故，Putnam 也指出：其複雜之處在於這兩大階段間交互影響的互動非僅一次性、而可

⁴⁴ *Ibid.*, p.430.

⁴⁵ *Ibid.*, p.434.

能常是反覆的進行。⁴⁶筆者將兩階段的談判示意圖整理繪製如圖三所示：



圖三：雙層博弈示意圖

資料來源：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第二，依據 Putnam 的定義，「獲勝集合」意指：「在第一個階段所有達成所有可能『獲勝』的國際協議集合。因此，「獲勝集合」即是在第一個博弈階段所達成的協議、再得到第二階段國內選民的接受與認同之範圍。」⁴⁷而「獲勝集合」越大，越有助於協議締約方彼此重疊的機會；進而促進合作與協議生效的可能性。其示意圖可參照圖四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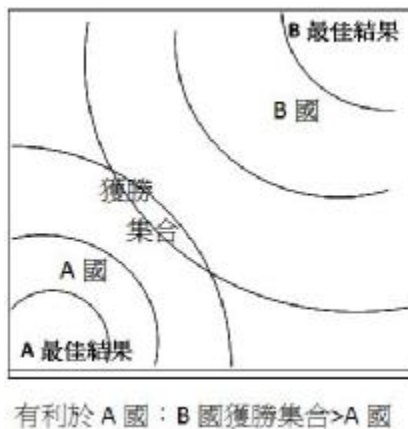
圖四：獲勝集合與合作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p. 437-447.

⁴⁶ Ibid., p.436.

⁴⁷ Ibid., pp.437-438.

影響「獲勝集合」的三大決定因素：（一）第二階段中的偏好（preferences）及政黨聯盟（coalitions）因素。獲勝集合的規模取決於第二層級內權力的分配、偏好及可能的聯盟成員。⁴⁸（二）第二階段的政治制度因素。國內憲法制度賦予國父有權審視國際協議的核准與否，進而增加門檻並降低國際合作的規模。而主要決策者的自主性若愈高，愈能增加獲勝集合並增加達成國際協議的可能。（三）第一階段中談判者的策略因素。談判者的策略在於極大化對方的獲勝集合。因為即使增加己方的獲勝集合能夠較容易地達成協議，但卻也使得自己身處較弱的談判位置。⁴⁹ 其示意圖可參照圖五所示：



圖五：有利於 A 國的獲勝集合示意圖

資料來源：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447.

筆者將 Putnam 所界定的談判兩方假設為 A 國與 B 國，圖五的左下角是 A 國的最佳結果；右上角則是 B 國的最佳選項位置。圖中所描繪的是當

⁴⁸ Ibid., p.442.

⁴⁹ Ibid., pp.443-447.

B國的獲勝集合範圍遠大於A國時，儘管雙方在重疊交集的區域達成了協議，但審視其結果是較有利於A國的。因為其達成協議的區域位置座落在較趨近左下角的A國最佳結果位置。反過來說，若A國的獲勝集合範圍越大，則最後的交集區域則會趨近於接近右上角的B國最佳結果位置。總的來看，第一階段的談判者會盡可能的擴大對方的獲勝集合範圍，以期最後的協議結果愈趨近於己方的最佳選項位置。

(二) 雙層博弈與氣候環境議題的結合

若以「美國」國內政治及國際關係之互動發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將「雙層博弈理論」與氣候環境議題的結合分析說明如下：

第一，「不協議成本」(the cost of no-agreement)。Putnam曾在雙層博弈之論中提到：「對國內選民而言，『不協議成本』愈低、則『獲勝集合』愈小。」⁵⁰就全球氣候環境及暖化議題的協商談判而言，其「不協議成本」的代價是高昂的，各國若無明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協議與規範，未來將使全人類的生存環境遭受更加嚴峻的威脅。是故，從高昂的「不協議成本」來探究談判各方獲勝集合的增加幅度，將有助於觀察各國在氣候環境變遷議題的態度。

第二，全球氣候變遷議題深受美國國內因素所限。雙層博弈之論中提到眾多影響國際協議核准生效的重要國內因素，包括：領導人（談判者）的偏好及選票考量、國內政治制度所設的門檻…等。就氣候變遷環境議題而言，研究美國近代歷屆總統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程度、偏好及其為迎合選民期望的選舉考量因素，與觀察美國國會審議國際協議通過的程序限制，均有助於研究美國對外氣候變遷協議的態度轉變。

第三，氣候及環境暖化議題與美國極大化他方「獲勝集合」的體現。就雙層博弈理論中所提出的國家能力與簽訂國際協議需求的「不對稱關

⁵⁰ Ibid., p.442.

係」中可發現，⁵¹在氣候變遷及暖化議題範疇裡，豐沛的天然資源、相對強盛的國力與優越的國際地位皆會成為影響美國在國際氣候協議及談判中的態度。因此，當美國簽訂氣候變遷協議的需求及「獲勝集合」較小時，若欲使雙方的「獲勝集合」有交集，則必然走向極大化他方「獲勝集合」的發展。這也恆常是存在於「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的環境爭議。

伍、結論

環境議題已然成為當前最棘手，最困難的集體行動。本文嘗試以回顧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之理論背景及發展為開端，期能找出一個解釋力相對足夠的環境議題理論分析，以提供後續對於國家間環境議題合作研究之基礎。因此，本文將國際關係各大理論與氣候變遷及環境議題結合。在文獻回顧與分析中發現，現實主義運用於環境議題可看出國家仍著重其國家利益及理性層面因素的考量，對於國家合作的發展抱持較為悲觀的看法；而自由主義則是強調國家間透過環境議題的合作實能帶來的長遠的好處與收益，隨著行為者的日趨多元，協商談判也逐漸將武力的角色加以取代；建構主義重視價值及國家間的互動，同時認同將科學融入研究的客觀性意義。然而，就本文實際研究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的主題而言，筆者發現上述理論內容無法完全確切地解釋現今各國氣候環境變遷議題合作之狀態與發展。舉例言之，「自由主義」理論雖強調了「合作」所帶來的互惠收益，但現實世界多次氣候變遷及國際合作會議的現況，卻使我們觀察到國家間「衝突」本質在國際氣候變遷合作場域中的展現。又就「建構主義」而論，強調整體國際結構或制度對個體的影響因素固然重要，但卻不能解釋現今國家角色與氣候環境變遷議題中，國家行為者同時受到外部因素及內

⁵¹ 依據 Putnam 的雙層博弈理論，這裡的「不對稱關係」乃意指國力相對強盛及富足的國家，由於其「獲勝集合」較小，故簽訂國際協議的需求比例也較低。詳細內容參見：Putnam, *op. cit.*, p.443.

部因素的影響及控制。因此，國家間權力及國際結構之分配等種種內、外因素皆須考量在內。

而若就現實主義而言，其核心論點主張較能符合當前各國因應氣候環境變遷議題的現狀。然現實世界並不完全如「攻勢現實主義」論者所述，無政府狀態下是無法避免的衝突。因此，國家間針對環境議題選擇合作或衝突之發展路徑，必須視當時的內、外因素加以考量。總的來說，傳統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不能構成本文議題研究的理論核心。因此，本文的理論基礎即援引了現實主義理論中的中間路線—「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時納入了「第二意象反轉」之論，以及結合強調內、外在因素互相牽連影響的「雙層博弈」理論主張。將此三項重要的理論基礎結合，以期能提供在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下的國際合作議題研究中，有一清晰、完整的分析全貌。

1990至2000年的十年間，大型天然災害增加了3倍，而氣候異常現象所帶來的災難在世界上將會越來越頻繁。紀錄片《藍色星球上的難民》就是一部突顯目前應迫切正視的議題—「環境難民」。根據片中所述：「環境難民已不再侷限於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沒有國界。關於氣候變遷，人類所無法理解的是環境無法恢復原狀。根據聯合國2003年的報告，環境難民的人數有史以來超越政治和戰爭的難民數……。」此影片中記錄這些因生活環境的日益惡化而被迫離開家園的百萬人口，不僅包含了馬爾地夫、巴西等國，甚而包含了已開發國家—加拿大。這說明了環境議題已不分程度的跨越了國界，成為現階段人類所應共同面對的議題。影片中所紀錄的環境問題不僅嚴重影響並剝奪地球居民的永續生活環境，同時亦喚醒了我們思考對於有效性「環境合作」議題之重要性。「環境議題」是否真如紀錄片之引述所言：「環境難民的問題被政府漠視，他們的聲音被埋沒在政客與企業的利益交換中……」？

全球氣候變遷議題深切影響國際團體及國家行為者，國際組織、非政

府組織及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亦對此作出相關回應。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下，各大國際性環境會議與協議和國家間之互動備受各界關注。身為當今世界強權的美國，其對環境議題的參與立場與態度成為牽動國際環境議題合作的要素。本文以「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與國際關係理論探討」為題，除了試圖突顯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議題的重要性外，更結合此議題將國際關係中的主要理論內容一一檢視。期許本文可作為未來研究全球氣候變遷及國際合作議題的重要理論基礎，未來將理論分析融入環境議題的實際案例中，期許能為台灣的環境及暖化議題研究盡一份心力。